

纳赛尔时期埃及对阿盟政策的探析

吴秋敏

(邢台市内丘中学, 河北 邢台 054091)

摘要: 纳赛尔时期埃及对阿盟的政策是“领导、团结和统一”, 实现这个政策的手段是通过对殖民主义、阿拉伯保守势力和犹太复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实现的。20 世纪 60 年代埃及的对阿盟政策取得了成功。

关键词: 埃及; 阿盟; 政策

中图分类号: K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115(2010)01-0078-04

The Analysis of the Egyptian Policies to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Nasser

WU Qiu-min

(Neiqiu Middle school in Xingtai, Xingtai 054200, China)

Abstract: To make sure the “unity” and the “reunification” among the members under the leading of Egypt is the Egyptian Policies to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way to achieve this policy is through determined fighting with colonialism. And the policy achieved its success.

Key words: Egypt;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policy

一、埃及对阿盟政策确立的原因

1. 国际局势和巩固政权的考虑

“七·二三”革命后, 埃及革命政府就英国撤军问题同英国进行谈判, 1954 年两国签订了撤军协议, 埃及取得了完全的独立, 但独立后埃及面对的国际形势还十分严峻: 英国从埃及撤退后, 在中东加强了对其他阿拉伯国家如约旦和伊拉克的控制; 法国残酷地镇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 以色列同埃及处于敌对状态。为巩固政权, 埃及需要联合其他阿拉伯国家来共同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再者, 提倡阿拉伯民族团结与合作, 最终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 也是近代以来无数的阿拉伯先进分子奋斗的最高目标。因此, 纳赛尔坚持对阿盟的团结与统一政策, 是顺应埃及面临的国际环境和阿拉伯世界人民感情的需要的。

20 世纪 50~60 年代中东发生的几件大事促使纳赛尔大力促进阿盟各个成员国的团结。一是巴格达条约事件。伊拉克参与创建巴格达条约集团举动, 遭到纳赛尔的坚决反对,

他认为这是殖民主义企图重返中东, 重新控制阿拉伯世界的阴谋。他利用阿盟向其他阿拉伯国家, 主要是伊拉克施压, 还以阿拉伯国家签订联合防御组织来对抗巴格达条约组织, 煽动伊拉克人们推翻亲西方的伊拉克努里政府。

二是以色列的军事威胁。为离间美埃关系, 报复巴勒斯坦战士以埃及领土为基地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 以色列接连发动了对埃及的几次报复进攻, 埃及军队不是以色列军队的对手, 遭到很大损失, 但埃及领导人出于政治考虑, 夸张地宣称: “埃及将给以色列上使它难于忘记的一课……埃及的军事力量比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军力综合还大七倍。”^[1,p56]埃及的态度受到约旦, 叙利亚、沙特, 甚至其对手伊拉克的欢迎, 他们纷纷表示支持埃及。阿盟秘书长阿卜杜·哈利格·哈苏奈也呼吁各阿拉伯国家和整个阿拉伯世界支持埃及的反对以色列的立场, 他说: “埃及军队的立场是每个阿拉伯人的骄傲。”^[1,p56]埃及从中看到阿拉伯国家团结的力量: 只有阿拉伯国家团结, 埃及才可以对付以色列的威胁。

收稿日期: 2009-09-22

作者简介: 吴秋敏 (1968-), 女, 河北邢台人, 邢台市内丘中学高级教师, 研究方向为中东历史。

三是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招致英、法、以三国对埃及的入侵，但埃及人民在纳赛尔的领导之下，依靠美苏及国际社会的支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阿拉伯各国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叙利亚和沙特与英法断交，约旦与法国断交，三国都宣布总动员，准备出兵参战；沙特停止向英法供应石油，叙利亚和约旦切断了境内的油管，使其不能从伊拉克向欧洲输送原油，利比亚虽然和英国结盟，但不准英国把他作为进攻埃及的基地。”^[2]阿盟谴责西方对埃及的侵略，宣布将全力支持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立场。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一致再次使纳赛尔看到了阿拉伯国家团结的力量。

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胜利和埃及叙利亚的合并使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达到顶峰。埃及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被其他国家所承认，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印度提议先在中国举行中、苏、美、英、法印度和埃及七国会议，商谈无限期停火问题”^[3]。威望的提高，使纳赛尔在前进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武断行事，认为阿拉伯世界的统一也不再是遥遥无期了，“阿拉伯民族已经不再需要证明各国之间统一的必要，统一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变成了阿拉伯人存在的现实”。^[4]因此，他决定利用自己威望，推行了激进的阿拉伯统一政策，把埃及的领导地位和埃及的政策强加于其它阿盟，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干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内部事务。自此，埃及对阿盟的政策开始片面强调阿拉伯世界的统一，结果是埃阿关系严重受阻。

2. 纳赛尔的个人因素

纳赛尔 1918 年 1 月 15 日出生于阿西乌特一个邮差的小资产阶级家庭，母亲是尼罗河三角洲的北方人，父亲是上埃及人，属于赛义德氏族，这一氏族的人身材高大，性情高傲，易于激动。纳赛尔的出身塑造了纳赛尔的性格，使纳赛尔有极强的革命性，同时极富有领袖气质。

在纳赛尔不到 20 岁时，他阅读了大量的例如伏尔泰、卢梭和狄更斯这些哲学家的著作，还有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和甘地的个人传记。阅读这些哲学著作，使纳赛尔日益成长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它们使纳赛尔看到了一个民族、一个人应该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而这就要求国家独立，“而独立要求能最终和完全消灭所有的外国占领和干涉”^[5,p20]，阅读这些个人传记，使得纳赛尔认识到应该有一个杰出的人物来掌控埃及，而这个杰出的人指的就是他自己。

1948 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对纳赛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纳赛尔目睹了埃及高级指挥官们指挥无能以及负责供应医疗设备和武器的部门的腐败，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必须推翻腐朽的国王统治。另一方面，他目睹了阿拉伯同盟国之间由于缺少配合而招致失败的惨状，开始认识到：“阿拉伯人只有团结起来，一致努力，才有可能保卫自己。只要他们仍然是一些互不妥协的单独民族，他们还是会上帝国主义

的当的，还是会一个一个的被任何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强国所吃掉……以色列的出现已经说明，埃及现在除了与那些使用同一语言的人携起手来反对以色列和任何外国的侵略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5,p20]于是，从那时起，纳赛尔就变成了一个泛阿拉伯主义者，竭力主张阿拉伯的团结一致才能给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必要的力量。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纳赛尔强调对阿盟的领导，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埃及国家利益，在他心目中，他是以“家长”的身份去领导阿拉伯世界，为阿拉伯民族谋取利益的。纳赛尔“也常常以一个阿拉伯人的身份考虑问题”^[6]，在纳赛尔心目中，埃及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

二、埃及“领导、团结、统一”阿盟政策的实践

1. 反殖民主义——巴格达条约事件中的埃及与阿盟

自阿盟成立以后，伊拉克始终没有放弃它的“肥沃新月计划”，为最终实现在伊拉克领导下的“肥沃新月地带”的统一，在美英的支持下，伊拉克与土耳其组建巴格达条约组织。

伊拉克与土耳其组建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消息传到埃及，立刻引起纳赛尔的愤怒，在他看来，伊拉克加入“巴格达条约”将是阿拉伯国家同北约挂上钩，从而损害阿拉伯世界的利益，有可能使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卷入到这种纠纷里去，这样将造成阿拉伯联盟的分裂，削弱它本来就不紧密团结的阿拉伯世界，“从而使帝国主义者得以按原计划把阿拉伯国家各个击破，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们的头上”^[5,p16]。其次，这样会“吸引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加入——这意味着肥沃新月计划的复活，从而接管阿盟的领导权，把埃及孤立出去，让他独自面对以色列的威胁”^[1,p72]；还有，伊拉克据此可以获得大量英国武器，由于伊拉克本来就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再加上军事力量的增强，它势必成为在阿拉伯地区占优势地位的国家，结果便是中东的政治中心从开罗转移到巴格达去，这对将建立在埃及领导下的阿拉伯国家团结作为最高理想的纳赛尔来说是无法容忍的。

阿盟在埃及的压力下接受埃及的主张，作出了强烈反对与西方合作的政策，支持埃及反对与西方联盟的计划。阿拉伯联盟的政治委员会发表公告，“联盟的每一个成员国政府都应声明决不受这个条约的限制，更不会考虑去接受它”^[1,p73]，但伊拉克一意孤行。

纳赛尔的努力没有达到目的，相反却使伊拉克加快了巴格达条约的签定，他决定召开阿盟会议来阻止伊拉克加入巴格达条约。在沙特等国的支持下，纳赛尔召集各国领导人到开罗召开阿盟外长会议，商讨阻止伊拉克签订条约。1955 年 1 月 22 日在开罗召开阿盟外长会议，纳赛尔告诫各国领导人：伊拉克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是同阿盟宪章和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的宪章规定完全相违背的。纳赛尔说：“巴格达条约是一项蓄谋已久的的计划，旨在分裂阿拉伯世界，迫使它屈从西方的意志……只要阿拉伯人能够团结，西方将为

自己的利益着想而提供武器和援助。”^[1.p73]他号召各国不仅要反对伊拉克，而且要谴责伊拉克。他还努力使其他阿拉伯国家相信：他这么做是为了加强阿盟的团结，履行阿拉伯联合防御条约^[1.p73]。埃伊双方在会上疯狂攻击对方，互不相让。

为阻止伊拉克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他开始对伊拉克进行更大规模的宣传进攻，“阿拉伯之声响彻云霄”，开始对伊拉克进行全天候的宣传攻势，呼吁伊拉克人民推翻追随帝国主义的努里政权。阿拉伯各国民众积极响应纳赛尔号召，呼吁政府支持埃及主张。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完全孤立。1958年，受埃及“七·二三”革命影响而建立的伊拉克自由军官组织在埃及的影响下发动军事政变，努里被杀，伊拉克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崩溃。

2. 反分裂势力——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分裂后的埃叙冲突为例

1961年9月28日叙利亚宣布脱离阿联，寄托着纳赛尔实现阿拉伯民族复兴的远大理想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名存实亡。这给纳赛尔以沉重打击。

叙利亚退出阿联后，纳赛尔认为是中东的保守君主国和以胡拉尼为首的叙利亚“反动势力”合力把叙利亚从阿联中分裂出去。因此，纳赛尔对埃及的对外政策进行调整，他首先断绝与阿拉伯保守政权的外交关系，声称决不同破坏阿拉伯联合的保守分子合作，他指责约旦国王侯赛因卷进了叙利亚从阿联退出的阴谋，他终结与也门的松散的联邦，谴责福阿德亲王承认叙利亚的独立。他说：“阿拉伯世界要想实现统一，必须赶走保守势力。”^[1.p116]其次，他对叙利亚展开了宣传攻击，谴责叙利亚领导人是“保守分子，是专制分子，是美国在叙利亚的代理人”，称“决不接受人民自由选举出来的政府”^[1.p116]。埃及向叙利亚国内输送大量武器支持叙利亚国内的亲纳赛尔分子进行反对叙利亚现政权的斗争。叙利亚向阿盟申诉：要求阿盟制止埃及对叙利亚国内事务的干涉。

应叙利亚的要求，阿盟理事会会议在黎巴嫩小城什陶拉举行。在会上，埃及代表间气氛十分紧张，双方在会上口诛笔伐，互不退让。在这场冲突中，叙利亚有沙特、约旦等国的支持，阿盟一些成员国态度明显地偏向叙利亚。纳赛尔认为：阿盟已经被保守势力所掌握，而保守势力意味着承认阿拉伯世界分裂的现状，阿盟已经不再是维护阿拉伯国家团结的组织，这个组织已经变得日益反动。为迫使阿盟就范，埃及决定退出阿盟。在8月28日阿盟理事会第八次会议上，埃及代表宣称由于无法忍受叙利亚对埃及政府的侮辱，而决意退出阿盟，埃及代表称：“联盟已变成各个成员国的耻辱……他已不能为阿拉伯各国的团结奋斗再做贡献了。”^[1.p11]

纳赛尔决意推翻他所敌视的叙利亚现政权。他发动埃及的宣传机器，鼓动阿拉伯民众特别是叙利亚民众，号召他们推翻反动的现政权；同时，派兵进驻也门，震慑阿拉伯世界保守势力。纳赛尔的持续压力终于产生效果，1963年8月，

叙利亚发生了军事政变，敌视纳赛尔的现政权被推翻，新政府致力于与埃及发展友好关系，向阿盟提出撤消对埃及指控，埃叙关系完全恢复，埃及表示将完全重返阿盟，支持阿盟的各项工作。

3. 反保守势力——以也门冲突为例

也门是阿盟的创始成员国之一，1918年获得独立后一直处在哈米顿·丁家族的独裁统治之下，激起社会各个阶层的不满，全国武装暴动此起彼伏。1962年9月26日，以萨拉勒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控制首都萨那，巴德尔国王逃亡北方，妄图依靠部落武装卷土重来，恢复伊玛目的统治，沙特害怕也门革命力量的发展会造成本国统治的不稳定，危及沙特的君主政权，决定全力支持保皇派力量，抗拒革命力量的发展。当时，革命力量还没有控制全国，力量比较弱小，面对有沙特和部落武装支持的保皇派力量反扑，革命力量不得不向埃及求助。

埃叙分离后，纳赛尔追求的阿拉伯统一大业严重受挫，纳赛尔把阿联分裂的原因归于阿拉伯保守君主国的阴谋破坏，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沙特、约旦等君主国，并与这些国家断绝外交关系。他深信只有消灭阿拉伯世界中的保守势力，各国只有遵从埃及的发展模式，阿拉伯民族才会实现彻底的团结和统一。“埃及将只与那些赞成埃及革命目标的国家保持紧密的联系”^[7]，1962年爆发的也门革命正好给纳赛尔提供了机会，纳赛尔认为：向也门派驻军队，不但能威慑沙特的保守政权，同时也能威慑驻亚丁的英军及其在波斯湾扶植的反动的酋长国。于是，纳赛尔对萨拉勒的请求给予积极回应，三天后即派大批埃军进驻也门，纳赛尔原以为：只要派象征性军队进入也门，不用几日就会结束也门内战。但保皇派军队在沙特的援助下，依靠山地，采取灵活游击战术，在战争中处于上峰，埃及军队和革命派军队不断受挫，损兵折将，深陷也门战争不能拔出。纳赛尔痛苦地说：这是我的“越南问题。”^[5.p513]

在埃及的授意下，阿盟代表团在秘书长的带领下出访黎巴嫩、沙特、约旦和也门等国，呼吁各国承认也门现政权，为维护也门的地区稳定而努力，但阿盟的调解被证明是失败的。由于双方缺乏互信，尤其是沙特，对阿盟调解意图表示怀疑，继续支持保皇派，冲突愈演愈烈，埃及以及共和派军队遭受的损失越来越大，尽管得到了前苏联的武器援助，但纳赛尔意识到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特别是为了一个贫穷的也门，纳赛尔开始寻求新的办法解决也门冲突。

这期间，叙利亚和以色列就约旦河水问题严重争执，两国局势骤然紧张，作为叙利亚的盟国，埃及不得不对以色列表示强硬的姿态，埃及向边界增兵，埃及以局势越来越紧张，纳赛尔感到有必要迅速结束也门战争，将兵力调往西奈半岛，同时也可以以商讨以色列改道约旦河水为借口，将阿拉伯国家首脑召集在一起，促成也门停战协议的达成。1963

年，纳赛尔向阿盟提出召开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的倡议，得到阿盟的热烈欢迎。“毫无疑问，在纳赛尔心目中，也门问题也是头等重要的一个问题”^[1,p157]。

在纳赛尔倡议下，1964年1月12日，第一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开罗召开。第三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后，埃沙开始就也门问题进行谈判，终于就也门问题达成一致，两国宣布将在也门问题上进行合作，并督促交战双方（革命派和保皇派）为达成最后的和平而进行和谈，在他们的努力下，也门的保皇派和革命派开始进行谈判。但由于保皇派和革命派互不信任，两派在新议会的地址和议员的代表人选上出现分歧，保皇派首先停止谈判并向革命派展开进攻。双方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纳赛尔倍感吃力。

为了同纳赛尔倡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相对抗，沙特国王费萨尔出访伊朗、约旦和土耳其等国，就成立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进行协商。纳赛尔认为：费萨尔与亲西方的伊朗结盟，证明他已经堕落到西方“急先锋”，企图联合伊朗来反对埃及。1966年2月，英国宣布撤出亚丁，这两件事的发生，使纳赛尔决定重新评估他在也门的政策，他认为：英国撤出亚丁、沙特积极组织成立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和保皇派与革命派的重新对立这三者肯定有某种形式的联系，表明帝国主义和阿拉伯国家的保守势力开始联合起来向以埃及为代表的进步阵营进攻，特别是针对埃及。纳赛尔宣称：埃及军队将无限期地待驻扎在也门，可呆上20年^[1,p153]，以便和英国沙特对抗到底，纳赛尔在第五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1967年“六五战争”中，埃及遭到以色列的沉重打击，国土完全暴露在以色列的打击之下，急需从也门撤军，在此情况下，纳赛尔不得不把埃及的安危放在第一位，把意识形态的纷争放在第二位，“对于我们来说，埃及比也门重要得多”^[1,p157]，1967年8月，埃及同沙特在喀什木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就也门问题达成一致协议：埃及立即从也门撤军，沙特停止援助保皇派，成立埃及、沙特和苏丹三方委员会，监督协议执行。埃及在也门苦战五载，牺牲重大，不得不铩羽而归。

三、埃及成功“团结领导”阿盟的原因

第一，纳赛尔非凡的领导才能是埃及在阿盟中拥有支配地位的重要因素。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同，中东地区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地区，是一个缺乏个性的地区，英雄在中东地区所扮演的政治角色是十分显著的。纳赛尔无可争议的领袖才能对阿拉伯民众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在巴格达条约的冲突中，在推翻与埃及敌对的叙利亚政权时，纳赛尔的个人魅力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埃及在阿盟中所居的支配地位。在阿盟中最高机构是秘书长，按照阿盟宪章，秘书长一职由埃及人担任，秘

书长既对阿盟负责，作为埃及公民，又对埃及国家负责。这使得秘书长经常从埃及的利益出发去制定阿盟政策，而且，“历史经验表明，联盟秘书长确实能按照他自己的意志对联盟施加重大影响，特别在重大问题上”^[1,p19]。阿盟的雇员中，埃及人占到75%，阿盟的永久地址是开罗，阿盟开会由埃及总统提议召开，纳赛尔时期，埃及负担的联盟经费年平均占总经费的30%以上。由于这一因素，埃及可以对联盟的决议发挥重要影响。

第三，纳赛尔利用了阿拉伯世界普遍的反西方、反犹太的民族情绪，赢得了阿拉伯世界人民的拥护，每一次领导对以战争，埃及都能得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拥护，地位骤然提高。以色列位于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区域、关系到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与帝国主义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三点是阿拉伯国家仇视以色列的原因。阿拉伯国家曾经大都是英、法等国殖民地，当地有反帝国主义的传统，因此纳赛尔高举反帝反以色列的大旗，特别容易受到阿拉伯人们的拥护。

第四，纳赛尔采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当时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在中东广为流行，阿拉伯人普遍把阿盟视为阿拉伯联合的象征，而纳赛尔又是这一联盟的首领，因此没有哪个成员国反对埃及的外交政策，一旦哪个国家反对埃及的政策，便会受到阿拉伯世界人们的反对。

第五，得益于埃及相对超强的国力。其他国家，特别是海湾产油国的经济大发展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各个国家实行石油国有化，收回被外国控制的石油所有权和开采权后才开始迅速发展，并且现在大都是以片面发展的石油开采和加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以色列也是在六五战争后最终确立了在中东的军事大国地位，而埃及的工业体系则相对比较齐全，军事力量在阿拉伯世界首屈一指。

[参考文献]

- [1] Tawfigy. Hasou. The Struggle for the Arab World: Egypt's Nasser and the Arab League[M]. London; Boston: KPI; Boston Mass., 1985.
- [2] 彭树智,苏瑞林.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97.
- [3] 赵伯乐.当代南亚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36.
- [4]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2年5月21日宪章》,p107,出版时间地址不明.转引自王锁劳博士论文《埃及民族主义研究——兼论现当代埃及-阿拉伯关系》,p83.
- [5] 安东尼·纳丁.纳赛尔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 [6] 陈建民.埃及与中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3.
- [7] 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90.

(责任编辑、校对：马桂秋)